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五号屠场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 五号屠场

〔美〕小库尔特·冯尼格 著  
周 广 译

责任编辑：王顺义 胡丽娟

## 世界禁书文库（百部）

---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30 字数：490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80595-696-0/1·275

定价：7960.00元

世界禁书文库

管仲道/編

远方出版社

## 前 言

书籍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古今载籍，浩如烟海”。长期以来，书籍对人类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正因为书籍是人类传播思想的工具，几乎伴随着书籍的产生，就出现了阻挠思想传播和禁毁书籍的力量和事件。书籍的禁毁是遍及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对思想和文艺作品的禁止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一部世界图书的禁毁史，也就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宗教、道德、文化诸领域不同力量之间交锋斗争的历史。追根溯源世界禁书可分为三种，即政治禁书、宗教禁书与道德禁书。

**政治禁书：**由于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政权最敏感的方面，暴露了当权者的隐私。针砭时弊，表达对执政者的敌视与不满，从而对统治政权构成威胁，最终遭到禁毁的厄运。

在人类历史上，此类焚毁图书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无论是理论探讨著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只要是对当政者不满不利的作品，都在遭禁之列，作者本身也常同时遭到迫害。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遭受纳粹法西斯禁毁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作者遭受迫害，有的甚至肉体被消灭。此后的《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玩笑》等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成为禁书。

**宗教禁书：**因为与某宗教的教义相抵触，从而触犯神权统治的著作。这些作品批判各神权中心，揭露宗教神学的虚伪，抨击

教会的专横与腐败,反对宗教文学,“亵渎”宗教的尊严,由此而遭禁毁之劫难。世界禁书史上,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禁书最为繁杂和残酷。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由于揭发了天主教僧侣的恶德败行,撕下了他们伪善的神圣外衣,讽刺了宗教的欺骗性与虚伪性。1497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被付之一炬。1569年,罗马教皇下令,将所有的《十日谈》一律查禁。而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一些作家和作品仍然是社会宗教团体的重点攻击目标;进入现代社会,宗教团体依然不断宣布禁书,把某些作家判定为“上帝的敌人”,禁书事件仍然接连不断。

道德禁书:被指责为违背道德,诱使人们走向丑恶、堕落和放纵的书。这些作品多与人性与情欲联系在一起,性成为关注的中心和描述的重点。往往被作为“淫秽作品”或“黄色小说”而遭到查禁。最突出的如《儿子与情人》、《继母颂》、《蜘蛛女之吻》、《寂莫的井》等都遭到了许多国家不同程度的查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众多优秀的著作虽然遭以厄运,身罹禁列,然而有价值的著作永远毁灭不了。这次组织众多知名学者、教授编译了这套《世界禁书文库》(百部),基本涵盖了世界文学中不同时代的各类禁书,反映了世界禁书的全貌。在21世纪的阳光下,我们打开这扇尘封已久的门窗,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鉴赏历代世界禁书璀璨的神光。

由于编者的学识有限与个人的偏爱,在选目之时,难免有失偏颇,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

2001年8月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是有关战争的部分。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但是这部小说里我都化去了他们的真名。

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真呱呱叫）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成千上万。

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据他说他一度被美国人俘虏了。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已有的公寓房间舒适极了，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就这么回事。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给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能有

机会，有一天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

我很喜欢“好有机会有一天”的说法。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那么简单轻易的，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

不过当时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要写的东西——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要写的东西。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我所有的钱财都花在了你上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遇上了什么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便回答他说道：  
“在下名叫雍永森，



## 五 号 屠 场

---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耸肩扬眉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我会跟他们说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很明显：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使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想看看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能成有钱人，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极有门路，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久违的哪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马上就听出了是我。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

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可以去看你吗，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还是答应了。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只因为废墟中拿了一只茶壶而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能成为我写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当中最好的，或者说最美的部分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中间空白是故事的经过。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显露在纸的另一侧。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事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

## 五 号 屠 场

兵看守着，即将解放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人换一人。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保存在身边至今。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窖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就这么回事。

一个英国人傻头傻脑，牙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还用布包拍我脚面。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一只钟在里面摆着。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使我们又白又胖。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爱怀旧，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在床上，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朋友。“电话员，你能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吗？我想她住在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没关系的，谢谢。”

于是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爱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不知道吧？你蛮好。”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假如我们喝了好多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不太清楚。”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可能还用这套来教。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战后在大学里得到的一个道理。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连续十六个小时未休息。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那些支持我们的机构没有断了联系。

## 五号路场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妇女是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有了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钩在了门口的饰边上。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

“他妻子反映如何？”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说什么。”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怎么反映。”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跟她讲述了一遍。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棒糖。“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比这还惨的事很多。”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有被大肆宣扬。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讲述集中营的情况，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让任何人都比原来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公司的老板是我渴望见到的一个最刻苦的人。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就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变得比原来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何这么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大声朗读来信给妻子听，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

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打过电话两周后的一天，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与我同往的是两个女孩子：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能够欣赏一会儿河边景色。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从崖而降，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偶尔地提醒她们道。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带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护士是妇女的适合工作。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也许对这个夜晚感到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聊聊，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再享受不了烈性酒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去把她丈夫陷害了。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不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开了门又关上了，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与你不相干。”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好像又回想到了战时情景，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



## 五号战场

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致就这些，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而且是跟我生气了。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承认。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是责备的问话。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的角色。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让任何人的娃娃死在战争里。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五千页写好后我会再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